1978—1998 年双轨制时期中国居民消费特征研究

张月英

（聊城大学 图书馆，山东 聊城 252059 ）

摘要：1978—1998 年双轨制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居民消费进入到需求旺盛、量的扩张阶段，在消费途径、消费内容、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消费途径上，农村居民商品性消费成为主体，城镇居民供给半供给制福利性消费逐步减少。在消费内容上，物质性消费仍然占据消费的主要地位，而精神性消费还未提上日程、所占比例较小。在消费结构上，经历了贫困型到温饱型再到向小康型的历史性变化，逐步向高层次迈进。在消费行为上，居民消费的自主选择权逐渐增强，大多数消费者都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消费秩序尚处于建立过程之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盲目攀比消费盛行、崇洋消费心理严重等不良问题对中国消费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消费品和服务质量；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把握新型消费特征，积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关键词：双轨制时期；居民消费；过渡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2-0058-09

收稿日期：2024-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58）：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消费史（1949—2019）。

作者简介：张月英（1970-），女，山东阳谷人，聊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2.013

居民消费是居民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根据其收入状况，取得消费资料并进行使用与消耗的经济活动。从微观角度上看，它是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在一定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从宏观角度上看，它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与生产、分配、交换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发展既受到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消费习惯、消费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又受到发展战略、经济体制、产业结构、人口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等经济社会动态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增强，同时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的机制依然发挥作用但逐步弱化，中国经济体制进入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双轨制”经济体制时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98 年。1978—1998 年双轨制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中国居民消费进入了有史以来的大发展时期，人民群众生活实现了战胜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转变。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居民消费的“量的不足”，这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进入到需求旺盛、量的扩张阶段，在消费途径、消费内容、消费结构、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显著的过渡性特征。

一、中国居民消费商品化程度迅速增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买方市场的形成，中国消费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费品和劳务供给日益丰富，居民消费需求与市场供给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经济型和自然经济型的居民消费模式逐步被打破，居民消费领域不断扩大，居民消费途径商品化倾向显著增强。

（一）农村居民商品性消费成为主体

消费商品化是指消费对象的商品化，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原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

求。改革开放前，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居民消费形成了相对独立、差别较大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两大群体，农业生产力较为落后，农村居民实物性收入偏高，几乎达到总收入的70%，导致农村居民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性消费，商品化程度较低。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品购买量迅速提高，农村居民不再满足于自产自用、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生活消费向商品性消费转变。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中，商品性消费支出为44.84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39.71%；自给性消费支出为68.06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60.29%。[①] 可见，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基本上以自给性消费为主，市场化消费程度较低，在消费上对市场的参与力、依赖性和选择力都很小。[②]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中商品性消费支出数量迅速提高，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自给性消费迅速下降。1985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平均每人商品性消费支出为185.62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60.20%；自给性消费支出为122.73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9.80%。1998年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平均每人商品性消费支出为1128.16元，所占比重为70.94%；自给性消费支出为462.17元，比重仅为29.06%。[③]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商品性消费在农村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从80年代中期开始占据主体地位，即农村居民消费从自给性消费为主转向商品性消费为主，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对市场的依赖逐渐增强。

从消费商品化具体进程看，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消费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较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消费商品化发展速度较快，商品化比重从1978年的39.71%增加到1985年的60.20%，提高了20.4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消费商品化比重提高2.90个百分点。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由于触及到旧体制的深层本质(这是产生消费非商品化的关键)，虽然农村居民消费商品化、市场化绝对量仍保持较大增长，但发展速度明显下降。1986—1998年农村居民消费商品化比重仅提高9.61个百分点，远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速度，农村居民消费商品化发展呈减速态势。

在农村居民消费商品化结构中，食品消费是温饱阶段消费的核心，与衣着、居住消费相比，食品消费商品化程度最低。1978年食品商品性消费在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24.06%，1998年上升到50.48%，提高了26.42个百分点；衣着消费商品化程度较高，持续稳定于89.00%－98.96%区间；居住消费商品化程度处于衣着和食品消费之间，商品化消费比重从1978年的51.30%提高至1998年的83.19%，比重上升了31.89个百分点，商品化、市场化速度最快。[④] 食品、衣着、住房商品化消费比重和发展速度差异是由三者消费资料来源特点和改革开放后农业、轻工业、建筑业等发展状况决定的。

(二)城镇居民福利性消费逐步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资源禀赋不利于重工业发展的情况下，为保证国有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和积累率，国家采取了低工资制度等压低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方法。作为补偿，国家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几乎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补偿，如就业保障、公费医疗、免费住房、义务教育和退休养老制度等。这样，城镇居民形成了货币工资＋实物福利＋基本消费品低价配给三位一体的个人收入分配模式。从消费角度看，城镇居民消费中具有很强的产品经济成分，形成了福利型消费体制，突出特点是消费资料非商品化，消费行为非市场化。城镇职工消费不是直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而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消费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很低。

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传统消费体制逐步解体、新的消费体制建立的过程。1978—1984年，城镇居民的体制性约束基本未变，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基本上保持着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特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国家改革价格体制，放开了大部分农产品和消费品的价格，转由市场定价，消费品市场逐步形成，但重要消费品如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必需品粮、油、棉等和公用产品的配给制以及传统福利制度在城镇依然如故。到80年代末，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显露出来，出于治理整顿的需要，国家对一些重要生活消费品和公用产品的价格重新冻结，消费品的市场化、商品化出

---

①③④《中国统计年鉴(198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第675页，第341页，第341页。

②徐明焕：《居民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效应浅析》，《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现波折。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从根本上奠定了居民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的制度基础。至此，传统的福利型消费模式开始解体，产品消费在城镇居民消费中的比重逐步减少，消费资料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增强。到 1997 年前后，更多的消费品进入了市场，买方市场开始出现，城镇居民消费从以“供给制”为特征转向以“自理型”为特征。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城镇居民“自理型”消费领域逐步拓展，商品化程度不断增强，福利性成分逐渐减少。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类别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吃、穿、用三个领域，引进市场机制的成效比较明显，消费品实现了商品化。然而在住、行、医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则明显不足，消费品未完全纳入个人商品消费领域。1998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 4331.61 元，人均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三项消费支出为 2764.58 元，吃、穿、用三项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 63.8％，成为居民消费支出的主体。城镇居民实际消费价值大的住、行、文化消费支出分别为 408.39 元、257.15 元和 499.39 元，所占比重仅为 9.43％、5.94％和 11.53％。① 住房是城镇居民福利消费的重要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化，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经历了由房租较低、所占比重微小，到缓慢增长甚至停滞不前、比重反而下降，再到快速增长、比重不断提升的变化过程。1982 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支付房租 7.08 元，占生活费支出比重的 1.50％；1985 年平均每人支付房租不升反降，为 6.48 元，所占比重仅为 0.96％；1991 年人均年支付房租 10.66 元，比重为 0.73％；到 1998 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增加至 408.39 元，比重提高为9.43％。1998 年下半年，政府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住房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实行住房商品化、货币化。

综上分析，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双轨制时期商品经济地位虽不断上升，但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仍然占有一定地位。因此，城乡居民分别实行着商品经济下的市场交换和产品经济下的实物配给、商品经济下的市场交换和自然经济下的自给自足两种渠道并行的消费方式，这构成了双轨制时期中国居民的特有消费现象。

毋容置疑，双轨制时期居民消费商品化程度迅速增强，与中国商品市场（特别是消费资料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是分不开的。然而，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商家法治意识淡薄、消费者辨识度低、执法部门监督不到位等，致使消费品市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80 年代，假冒伪劣商品出现在日常生活用品和一些简单的耐用消费品之中，如香烟、白酒、副食品、小型电器等。到 90 年代，假冒伪劣商品几乎蔓延到商品生产的各个领域。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经营主体从少数个体工商户发展到一些公有制企业，甚至出现了造假村、造假乡镇等，其生产手段也从小作坊式生产发展为借助新兴科学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如盗版光盘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影响消费品市场的正常发育，同时也使消费者丧失了购买国内产品的信心，从而转向购买国外进口产品，造成国内庞大的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现实动力。②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还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大损失。据测算，90 年代后期中国假冒伪劣商品的年均产值在 1300 亿元左右，国家因此年均损失的税收多达 250 亿元。③ 由于假冒伪劣商品可以赚取高额利润，其生产者和经营者就会根据寻租原理，通过寻租方法找到保护伞，一些干部在蝇头小利面前忘却初心、丧失意志，堕落成假冒伪劣商品制售者的保护人。

二、中国居民以物质性消费为主导

根据居民消费的对象及其特征，消费可以分为物质性消费和精神性消费两大类。物质性消费是指居民对衣、食、用、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品及服务的消费，是居民生活消费的主要形式和内容；精神性消费是指居民对文化、教育、医疗等无形商品的消费，是在物质性消费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用来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按照世界各国消费发展的规律，以消费内容的转移

---

①《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20 页。

②曾坤生、易红玲：《论我国消费市场假冒伪劣商品的问题与治理》，《消费经济》1999 年第 4 期。

③夏兴园、萧文海：《论我国经济转型期假冒伪劣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为标志，居民消费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即以吃、穿消费为主的低级阶段；以用品和住房消费为主的中级阶段；以精神消费为主的高级阶段。前两个阶段以吃、穿、住、用为中心，以物质性消费为主导，高级阶段则以精神性消费为主导。即居民消费要先经过物质性消费为主的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上升到精神性消费为主的高一级阶段。这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共同规律，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双轨制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总体上仍处于温饱巩固阶段，生活处于较低水平，物质性消费占据了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

（一）农村居民基本上是物质性消费

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生活消费品支出代表农村居民物质性消费支出。1978—1984年，农村居民家庭物质性消费支出迅速增加，1978年为112.90元，1984年增长至267.27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97.28%、97.62%，所占比重极大。这一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品支出增长了136.73%，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了135.91%，农村居民物质性消费支出的增长大于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① 1985—1991年，农村居民物质性消费支出大幅度提高，1985年为308.35元，1991年增长至571.17元，所占比重分别为97.14%、92.16%。② 物质性消费支出比重有所降低，但仍保持高位。这一阶段，人均生活消费品支出增长了85.23%，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了95.25%，物质性消费支出增长落后于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1992—1998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品支出持续提高。选用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交通通讯五部分支出之和作为物质性消费支出，1992年农村居民人均物质性消费支出为585.58元，1998年增长至1329.92元。物质性消费所占比重持续降低，所占比重分别为88.86%、83.63%，占比仍然较高。③ 这一阶段，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情况看，总消费中物质性消费所占比重逐步减少，精神性消费所占的比重相应提高。然而，从整个双轨制时期看，物质性消费占据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绝大多数比例，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所占比重极大。

从农村居民物质性消费内部结构看，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在某些年份还有回升现象。1985年农村居民吃、穿两项支出所占比重高达67.51%，1998年两项支出仍然占到59.59%，突出表现了温饱阶段农村居民消费以吃、穿为重心的典型特征。在解决了吃饭、穿衣基本问题之后，食品、衣着消费支出持续增加，虽然其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据消费内容的主要地位，消费目标由吃饱转向吃好，穿暖转向讲究档次，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住房成为农村居民的第二大消费项目，但用品消费档次明显较低，1985年住、行两项支出所占比重为19.97%，1998年有些回落，仅占18.88%，大大低于吃、穿两项支出比重。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农村居民消费仍具有较高程度的物质性，精神性消费发展缓慢，总体处于消费的低级阶段。

（二）城镇居民以物质性消费为主

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变化情况看，随着城镇居民生活从温饱跨入小康阶段，越来越多的居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关注生活质量，但是消费观念的改变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城镇居民家庭支出的主要投向仍然集中在物质消费方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中，购买商品支出即为物质性消费支出，非商品支出代表服务消费。1981—1984年，城镇居民购买商品支出大幅提升，1981年城镇职工家庭人均年购买商品支出为420.36元，1984年增长至514.32元，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92.01%、91.93%，所占比重颇大。④ 这一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年购买商品支出增长22.35%，人均生活费支出增长22.46%，表明城镇居民物质性消费增长与生活费支出增长几乎同步。1985—1991年，城镇居民物质性消费继续快速扩张，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商品支出为621.48元，1991年增长到1294.85元，城镇居民物质性消费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92.32%、89.07%，相比前一个

①《中国统计年鉴(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572页。

②《中国统计年鉴(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③《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④《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版，第429页；《中国经济年鉴(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562页。

阶段略有下降。[①] 这一阶段，城镇居民人均物质性消费增长108.35%，人均生活费支出增长115.96%，相比前一阶段，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大大提高。1992—1998年，城镇居民物质性消费持续攀升。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物质性消费支出为1403.59元，1998年增长至3430.12元，城镇居民物质性消费在生活消费性支出中所占比重分别为83.95%、79.19%。这一阶段，城镇居民物质性消费支出增长了144.38%，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了159.07%，[②]居民消费增长速度持续提高，表明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长期不能得到满足的城镇居民基本生活需求急速扩张，居民消费数量全面补偿性增长。从整个双轨制时期来看，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消费水平快速提高的情况下，虽然物质性消费所占比重逐年减少，精神性消费所占比重逐步提高，但物质性消费仍然是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内容。

从城镇居民吃穿住用行等物质性消费内部结构来看，1985年吃、穿两项支出占生活费支出比重为66.81%，1992年两项支出比重为66.93%，1998年下降为55.59%，仍然占城镇居民消费的一半还多，这表明居民消费基本上仍然以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收入大部分消耗在吃、穿两个方面，吃、穿档次逐年提高，在饮食方面讲究营养和风味，衣着方面讲究名牌和个性，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由于城镇居民一直在福利型保障制度下生活，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由无偿型开始向自理型转化，支出有所增长，但由于这几方面改革进展缓慢，并未完全实行市场化，城镇居民仍然享受着相当程度的补贴。住、行两项支出及其比重逐步提高，但所占比重不大。其中住房支出比重较小，1985年城镇居民住房支出为6.48元，占生活费支出比重仅为0.96%；1992年居住支出为99.68元，占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5.96%；1998年城镇居民居住支出为408.39元，占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9.43%，仍低于10%。城镇居民住房支出较低，所占比重小是城镇居民福利型消费特点的突出表现。总体来看，双轨制时期中国经济尚处于工业化建设推进阶段，第三产业刚刚兴起，城镇居民生活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中心，物质性消费是主要消费内容且占据较大比例，而精神性消费还未提上日程、所占比例较小。

三、中国居民消费逐步向高层次迈进

经过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3.9%迅速下降到1998年的48.0%，城乡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贫困型，跨过温饱，整体向小康社会过渡，稳步向高层次迈进。具体表现在居民消费的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下降，穿戴用的比重上升，尤其是家用电器的需求增长迅速，城镇居民购买力指向逐渐朝住宅、教育、文化以及证券股票等特殊商品转移。[③]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的比重下降，衣着比重稳定，吃、穿质量提升。依据国家统计资料，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稳步提高，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由80年代中期的58%左右，下降至90年代中期的50%左右，90年代末期达到45%以下。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持的比重由1978年的67.71%一路下降至1998年的53.24%。各类食品消费数量全面迅速增加，食品内部结构明显改善，食物结构由粮食型向副食型、由单一型向多样化转化，膳食安排更加科学营养；衣着消费基本上与生活消费同步增长，衣着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城镇居民一直维持在14%左右，农村居民在10%左右。衣着消费中成衣化倾向增强，时装化、名牌化趋向明显，中高档服装成为居民消费追求的目标。

家庭设备、用品类消费比重上升，档次逐步提高。90年代末期，城镇居民家庭主要耐用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已经基本饱和，由于“小家电热”对城镇居民的影响，空调机、电话、组合音响等消费大幅增长，使得用品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有所上升；农村居民对新三件的拥有量高速增长，1998年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为32.59台，较1980年的0.39台增长了82.56倍；洗衣机为22.81台，较1985

①《中国统计年鉴(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

②《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③刘连叁：《当前中国消费者行为和消费心理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管理教育学刊》1997年第4期。

年的1.9台增长了11.0倍；沙发为82.53个，较1985的13.07个增长了5.31倍。①

居住消费支出比重增加，住房质量提高。城市住房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实施，由于房租提高和购买商品住宅，1998年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在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上升到9.43%，人均居住面积提高到9.3平方米，水、电、气等方面的消费增长较快；农村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由过去的扩大住房面积转变为提高住房质量，砖瓦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占住房面积的比重由1985年的52.93%上升至1998年的75.41%②，部分富裕农户住房向庭院式、楼房式发展。

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明显增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逐步进入城镇居民家庭，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这类支出增长较快，装电话、佩戴BP机，出门“打的”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城市医疗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居民自我保健意识的日益增强，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显著增长。

居民用于教育、文化以及证券投资等方面支出增加。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居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城乡居民用于文化娱乐和教育的开支增加较快，1998年城镇居民此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8.62%，比1992年的5.55%提高了3.07个百分点。90年代末期，社会上兴起“全民皆股”之风，城镇居民投资债券、股票的热情高涨，消费支出迅速增大。

总之，双轨制时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消费层次明显递升。一是由以吃为主的消费结构向以用为主的结构转化。③居民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而用、住消费比重迅速上升，实现了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生活水平的消费变革。二是物质性消费趋于稳定，服务性消费快速上升。经过整个80年代居民消费的全面增长后，城乡居民食品、衣着、用品支出比重逐步稳定，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基本普及，表明对吃、穿、用等基本生存资料的消费需求已达到阶段性饱和，同时以精神文化生活为特征的服务性消费比例稳步增长。城乡居民消费基本脱离了生存型消费结构，正在向“舒适型”消费结构转化。三是居民消费从单纯追求数量扩张转向数量质量并重。进入90年代，居民的食品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粮食、蔬菜等一般食品的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但营养丰富的肉禽蛋类、水产类食品的消费量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的增长速度变慢，但新建房屋中砖木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比重大幅上升，城镇居民兴起住房装修之风；用品消费中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新兴耐用品的普及率逐步上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支出成倍增长。这表明居民对生活资料的消费需求由以前的单纯追求数量扩张逐渐转到注重质量提高上来，标志着居民整体生活水平进入了温饱有余乃至小康阶段。④

应该看到，双轨制时期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显著提升的同时，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内部还存在着消费结构雷同化现象。这种雷同化倾向突出表现在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方面：一是低档耐用消费品在高、低收入户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以1988年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主要消费品拥有情况为例，在最低收入户中，黑白电视机的普及率达66.07%、自行车的普及率达154.54%、电风扇普及率达85.25%、缝纫机的普及率达67.76%，这与最高收入户的同类比重差别甚微。二是高档耐用消费品在高收入与低收入户之间的差别也比较小。仍以1988年城镇居民主要消费品拥有情况为例，如高收入户彩电普及率达57.30%，低收入户为30.18%；高收入户电冰箱普及率为38.30%，低收入户为18.33%；高收入户洗衣机普及率为79.93%，低收入户为65.10%；高收入户立体声收录机普及率为39.86%，低收入户为27.82%。⑤居民同步购买、同步消费所形成的耐用品消费的同构化、雷同化，形成了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几次耐用品消费热潮。从消费需求的经济效应来看，这种消费结构的雷同现象，虽然体现了居民消费的热点和巨大的经济增长点，为阶段性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但是在激发出巨大的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为需求空间的进一步扩大造成了结构性障碍。

---

①②《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第341-349页。

③江成龙：《论消费需求的三大基本规律》，《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5期。

④赵卫亚：《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9期。

⑤《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页。

四、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日益市场化

消费者行为是一个具有多角度规定性的范畴，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者行为是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储蓄决策行为的统一。消费者行为分为两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消费者所做的是将可支配收入以多大比例用于消费的决策；第二个层次则是消费者在决定用于消费的收入约束下，对购买和消费何种消费品（包括服务）以及各种消费之间保持怎样的比例关系的决策问题。改革开放前，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较低，面对一个维持基本生活、凭票供应的消费品市场，不仅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选择，也没有多少收入可用于购物，但可以保持日常的基本，储蓄较少，以备万一急需。居民的消费行为表现为超稳定的、少变化的购物方式，生活单调，消费整齐划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开始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消费者行为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消费者市场选择权逐步增强

1978 年以来，国家着力增加满足人民生活消费的农业和轻工产品生产，并逐步培育市场体系，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的市场格局。计划配置的生产生活资料大量减少，企业产品自销比例增加，城乡自由贸易市场迅猛发展，商品性市场消费份额迅速扩大。199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29152.5 亿元，按名义价格计算，比 1978 年增长了 18.70 倍；1998 年与 1985 年相比，集市数量增加了 55.49％，集市贸易成交额增加了 30.37 倍。同时，消费品品种不断增加以及新产品纷纷投入市场，消费者的选择空间扩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市场结构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消费品价格基本实现了市场化，消费品供给约束基本消除，消费者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偏好在不同消费品和劳务之间作出选择，不仅商品选择空间扩大，消费者选择权也大大增强，这样，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动选择逐步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主选择，消费者在市场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经济行为特征成为主流。

（二）消费需求呈现异质化

改革开放给国内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实现了商品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根本转变，供给方式由单一落后向多样现代化的重大变化，为消费者需求向多元化、高质量方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不同消费者群体的消费倾向出现分化，消费者需求显露多样化趋势，消费者行为异质化特点显现。

（三）消费时间偏好由即期转化为跨时消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存在普遍的信贷约束，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取决于现期收入，时间偏好是即期消费。改革开放后，资本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与消费者流动性相关的消费信贷开始放松，一些城市出现债券、股票市场及消费信贷。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促进了农民民间信贷规模的扩大。流动型约束弱化，为消费者跨时消费提供了条件。[①] 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个人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加之 1990 年以后，住房、医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的改革，使实物配额消费的份额比重缩小，商品性市场消费份额迅速扩大。两种因素促成消费者将多余的钱用于储蓄。据统计，1978 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210.6 亿元，到 1998 年增长到 53407.5 亿元，增长了 252.60 倍。消费者储蓄存量迅猛增长形成的金融资产，为居民跨时预算消费奠定了基础。

（四）出现盲目攀比、崇洋消费等不理性消费行为

双轨制时期，相较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盲目攀比消费尤为突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选择自由度迅速增大。由于城镇居民依然享受着大量的医疗、教育、住房补贴等，没有消费的后顾之忧。因此，面对突然出现的丰富的商品和劳务供给，往往不考虑是否真的需要，怀着别

---

①唐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消费者行为变迁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70 页。

人买得起、自己也要买的心理，表现出高涨的消费需求，形成了盲目购物、攀比购物现象，导致80年代城镇居民兴起了一波盖过一波的家庭高档耐用品消费热。居民消费生活中存在的盲目跟风攀比现象，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不成熟的消费心理相适应，本质上是消费主义的表现形式。消费主义是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近代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应运而生的畸形的消费形式，它将消费本身作为人生价值与目的，倡导消费对外在物欲与感官的满足，忽视内在的精神追求。[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社会上也出现了消费主义之风。一些人往往无炫耀性消费主体的经济基础，而仅以追赶时尚潮流或与同质性群体之间相互攀比来进行消费。居民对某种消费品的盲目消费，作为市场信号，诱导企业一哄而上，造成全国各地重复生产，产业能力盲目扩张。当该种消费品由热变冷时，生产能力过剩，形成产业的无序发展和低水平循环，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外，盲目消费行为否定了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的作用，使市场呈逆向变化，加重了经营企业的经营难度。居民的盲目攀比消费，容易引起大面积的抢购事件，制造居民消费恐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流通秩序。

部分居民还存在着严重的崇洋消费心理。改革开放以来，有些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消费一直投入极大的热情和财力，尤其90年代后期以来，对于洋货的信任度和青睐度迅速提高，大到彩电、摩托车、空调，小到口红、香水、肥皂、水果、饮料、奶粉等，凡是进口外国牌号商品，千方百计去求购，以致社会上出现了一阵又一阵洋货热。崇洋消费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现实产品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需求是崇洋消费的直接诱因。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未退出，消费者的愿望和目标的实现还需时日。这样，外国产品的进入正好可以填补国内消费者需要的空白点，崇洋消费便顺理成章了。其次，国产产品竞争力不强是“崇洋”消费的直接原因。[②] 由于国内企业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在生产能力、科研开发能力、管理能力以及营销方面的确与外国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国产商品在质量、品种、款式、方便度、科技含量等方面不能吸引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最后，消费者自身的非理性观念和心理素质是崇洋消费的内在因素。消费者的“崇洋”消费，对还在成长中的国内企业和消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对社会供求的平衡以及市场的正常供应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崇洋消费行为的日益高涨，不仅助长了人们盲目攀比、追求奢侈的做法，还增加了普通民众的额外经济负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庸俗化。[③]

结语

1978—1998年双轨制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居民消费开启了充满活力、日新月异的新局面。中国居民消费，在消费途径上商品化程度迅速增强，在消费内容上以物质性消费为主导，在消费结构上逐步向高层次迈进，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进入了重塑期。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借鉴双轨制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发展的成功经验，要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消费品和服务质量。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要持续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以引导产业创新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中可供分配和消费的份额，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二是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

---

①曾婕、邱秋：《引领消费文明 促进绿色发展》，《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②唐敏、茹华杰：《“崇洋”消费的原因分析》，《商业研究》1998年第6期。

③谢成森：《不良的消费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及治理》，《商业研究》1992年第9期。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三是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络体系，破除妨碍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动畅通，营造便利消费、放心消费的环境。① 四是把握新型消费特征，积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消费模式的变革，消费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为此，要为城乡居民新型消费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加强消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拓展消费新空间，打造消费新场景。要把握新型消费特征与变动趋势，培育壮大智慧产品和智慧零售、智慧旅游、智慧养老、智慧家政、数字文化、智能体育、“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托育”、“互联网＋家装”等消费新业态，加强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交通等消费跨界融合，积极拓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Household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Dual-track System Period from 1978 to 1998

ZHANG Yue-ying

(Liaocheng University Librar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dual-track system from 1978 to 1998,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Chinese household consumption entered the stage of expansion with strong demand and quantity, and fundamental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aspects of consumption channels, consumption cont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s. In the way of consumption, the commodity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had become the main body, and the welfare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with the semi-supply system had gradually decreased.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content, material consumption still occupies the main position of consumption, while spiritual consumption has not been put on the agenda, accounting for a small proportion. I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it had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change from poverty to subsistence and then to small well-being, and had gradually advanced to a high level.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residents' independent choice of consumption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most consumers were rational. However, as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 new consumption order we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the proliferation of fake and shoddy commodities, the prevalence of blind comparison consumption, and the serious consumer psychology of worship of foreign countries had also caused a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umer economy.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entering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enhance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vigorously develop the re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mpro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expand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larg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at is efficient, standardized, fair competition and fully open;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consumption and actively cultivate new forms of consumption.

Key word: dual-track system period; household consumption; transitional feature

[责任编辑　如初]

①林兆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8日。